

中国当代茶艺的概念起源、 发展流派与争论评述

宋时磊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自觉的总体背景下，“茶艺”概念最早由中国台湾省著名的民俗学家姜子匡等学者提出。茶艺概念意在与日本茶道或者韩国的茶礼相区别，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茶文化主张，同时易被社会理解和接受。经过两岸学者的不断理论构建、知识层累、品饮实践，茶艺概念有了相对统一的内涵体认，进入21世纪后茶艺也上升到“学”的理论化总结。各类主体开始回溯中国茶艺的历史，从地域、民族、宗教等多个角度挖掘茶艺资源，整理茶艺要素，形成众多的茶艺流派。最后，梳理了当今对于茶艺概念起源时间、过于重视“技”而忽视“道”等方面的观点争论，作出中肯的评述性分析，认为茶艺概念是对中国茶文化的合理凝练和概括，是当代中国学者原创性提出的、已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概念。

关键词：茶艺学；文化复兴；茶艺流派；概念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与遗产保护研究”（2016ZD229）

中图分类号：TS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2）09-00025-07

从长时段的历史视域来观察，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转型的过程，从蒙昧走向自觉、从自卑走向自信、并在自觉和自信中重构中国文化的主体性。^①费孝通在1997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是应对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趋势而倡导的不同文化相处之道，强调在文化互鉴、彼此相知的基础上自我反省、自我构建和自我认同。在当代文化复兴的大潮中，茶文化的发展是一种时代的症候性反映。茶文化是比较笼统的称谓，而在发展中学者提出“茶艺”概念，以与日本茶道文化相区别，这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自我阐释能力。^②概念一旦生成和被认同，各种主体从自身的视角展开构建，形成知识生产的历史叙事。^③从知识构建史的角度观察，茶艺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末诞生以来，在各种环境和力量的加持之下，经历了一场复杂而深刻的演变，丰富了当代中国人的

物质生产、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本文以“茶艺”概念为切入点，分析其知识“层累”、流派再造以及对教育和艺术等领域的影响。

一、茶艺概念的提出与茶艺学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曾有与茶艺近似的概念，如“艺茶”（即种茶）、“茶之为艺”等表述。茶文化学者陈文华曾列举了陆羽《茶经》、五代陶谷《荈茗录》、宋代陈师道《茶经·序》、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茶艺文录》等相关记载，认为这些都不是当代意义上的“茶艺”概念。^④特别是有学者用《茶艺文录》一书将“茶”“艺”二字连用，遂得出“茶艺”一词已出现于60多年前，进而否定当代学者对茶艺概念提炼的首创之功。这其实是不了解此书其实是茶的“艺文录”而非“茶艺”的文

录，而艺文录实际是艺文志，这是古代史书中的常见体例，是图书典籍目录汇编的一种方式。据笔者文献调查资料发现，“茶艺”一词首次出现是在晚清的《耐务通考》，其文曰：至于采、蒸、揉、焙、修、制等法，见于《茶经》《茶谱》者，固已详备，尤须参以新法，求抵至精，此茶艺之大略也。”^⑤此处之“茶艺”，是茶叶加工制作之意，跟当代“茶艺”概念仍有不同。民国时期，也曾有主张吃茶艺术化，或将品茶视为生活的艺术^⑥，林语堂等一批讲求生活情趣的文人，对饮茶的艺术化奉为圭臬。这固然有追求茶艺的旨趣，但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人饮茶追求的一种承续，尚没有茶艺的自觉追求。1948年，台湾省省政府委员兼农林处处长徐庆钟为《台湾茶业》杂志创刊号题词“发扬茶艺”^⑦，此处茶艺应是指茶的园艺，与品饮关系不大。

茶艺概念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二战后，台湾省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使台湾茶也迎来了出口的黄金期，乌龙茶、包种茶等输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茶叶在外贸中所占比例曾超过10%，其重要性仅次于稻米等粮食，赚取了大量外汇，为台湾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时期，台湾茶叶主要为外销茶，省内的本土性消费仅有15%—25%。20世纪70年代初期，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减产、禁运石油，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⑧在这种背景下，台湾茶叶的出口形势陡然恶化，大量茶叶积压、滞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台湾人民的收入情况大为改善，开始讲求生活的品质，文化休闲娱乐和各类社交的场所需求旺盛。这时人们对茶叶的需求就不仅仅是日常解渴提神的饮品，转而注重其中的审美感受和精神愉悦；对茶馆的需求同样不仅是闲聊的空间，而希望从其中获得多层次的文化体验。这一时期，因中美、中日外交关系的缓和，全球还兴起了“中国热”。一些比较敏锐的知识分子有了民族文化自觉的心理和意识，他们检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现饮茶的习俗和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又与百姓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紧密相连。怎样将饮茶流程化、规范化特别是艺术化，使之成为一项既充满生动的现实力量、又拥有高雅情调的特质，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任务。

茶艺概念便是在深刻的时代背景下，产业、民俗、文化等各界为推广茶和茶文化而密切互动的结

果。1974年，台湾省制茶工业同业公会成立“台茶宣传委员会”，在总干事林馥泉的领导下，大力宣传品饮台湾茶。当时茶菁价格低廉，从国外进口的咖啡处于强势地位，茶农颇受其苦。林馥泉找到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姜子匡想办法，姜子匡认为“我们中国人是喝茶的民族，咖啡是不可能取代茶的”。于是，他们两人又襄助蔡荣章举办“味茶小集”活动。在大力推广饮茶之风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需要一个明晰的概念凝练、概括这些茶文化活动。1977年此事提上议事日程，有人主张用“茶道”，但该词有两个问题：其一，日本已经专美于前，用这个词会被误认为是把日本茶道原封不动照搬到台湾省；其二，中国人向来敬重“道”，“茶道”一词过于严肃和神秘，不利于在民众间接受和推广。在讨论之中，又提出了“茶艺”一词，姜子匡认为该概念可以将中国的特质与日本茶道或者韩国的茶礼区别开来，是属于自己的文化主张。^⑨“味茶小集”也就成为当代茶艺馆的滥觞。

于是，茶艺概念获得了大家的普遍的认可，开始广泛使用。1977年，台北市仁爱路亮出“茶艺馆”的招牌。1978年，台湾省主要城市有了地方性的“茶艺协会”。1980年，林馥泉在台北举办茶艺讲座，其内容在《大华晚报》发表；蔡荣章以李瑞河的天仁集团为依托力量，成立“陆羽茶艺中心”，出版《茶艺月报》。1982年台湾全省性质的茶艺社团“中华茶艺协会”在台北成立，创办中华茶艺杂志社、出版《中华茶艺杂志》，举办中华茶艺选拔赛，推动茶文化交流。之后，还成立了“中华茶艺事业联谊会”、“天仁茶艺基金会”、“陆羽泡茶师联谊会”、“国际无我茶会”等茶艺组织机构，这些机构在不同层面上为茶艺的推广作出了贡献。在社团及各种性质的刊物带动下，茶艺的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在1980年代台湾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李浩成《谈茶说瓷：茶道与茶艺》（1982年）、刘汉介等编《中国茶艺》（1983年）、许明华《中国茶艺》（1983年）、刘华明编译《茶艺与养生》（1983年）、刘兴炉主编《茶艺精萃》（1984年）、许昆仲编《今日台湾茶艺》（1985年）、吴智和主编《中国茶艺论丛》（1985年）及《中国茶艺》（1989年）、曾国堡《家庭茶艺》（1986年）、章学农《中国茶艺入门》（1986年）、张宏庸《茶艺》（1987年）、季野《茶艺信箱》（1988年）、苏治芬《黄金店面新主人，茶艺馆》（1989年）、蔡荣章《现代茶艺》

(1989年)。这些成果或对茶艺展开学理性探讨,或普及茶艺知识,或记录台湾茶艺发展历史,是了解台湾省茶艺概念早期生成的重要参考资料。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流行文化深受台湾影响,茶艺概念同样如此。曾长期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工作的陈文怀1985年移居香港,在香港组建茗华发展公司和中华茶文化研究中心,推广中国茶叶和茶文化。在香港居留之时,他能够比较便利地阅览台湾出版的书籍,于是借此搜集台湾茶业新闻、史料等,特别是同行论述茶艺的话题和资料。在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后,他撰写的《台湾茶事》系列文稿在《中国茶叶》杂志发表,介绍了茶艺代表性著作的内容和观点、茶艺协会和陆羽茶艺中心的宗旨和活动业绩、茶艺表演和选秀活动等,并提出要推广茶艺、弘扬国饮。^⑩之后,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高菊儿将日本茶道与台湾茶艺做了对比分析,认为两者起源一样,目标一样,只是样子不一样:一个是日本人的样子,一个是中国人的样子^⑪,并对台湾茶艺的六个方面予以分析。1988年6月18日,紫砂壶艺名家许四海与宜兴紫砂二厂在上海展览中心联合举办了“复兴茶艺研讨会”,邀请了百余名专家研讨茶艺和茶文化,《文汇报》等予以报道。

在这些文章的发表和研讨会的举办之外,真正促进茶艺概念在大陆普及的是两岸人员的往来。1988年6月,台湾经济文化访问团到桂林、上海等地访问。随团人员“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创会理事长范增平是茶业界代表,他在上海与壶艺专家许四海探讨、表演茶艺,7月9日上海《文汇报》刊发了范增平专访《台湾茶艺特使在上海》,7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官方媒体的正式报道推动了“茶艺”概念的传播,而之后范增平又多次到大陆交流茶艺。1988年,台湾大学教授、台湾省茶艺协会理事长吴振铎夫妇应邀进中央常委、茶叶专家黄国光邀请到北京访问,在福建会见张天福并访问福建农学院,又到浙江农业大学等处交流。1989年,李瑞贤、蔡荣章等台湾茶艺的开拓者,率台湾天仁集团陆羽茶艺文化访问团20人,到北京、合肥、宜兴、苏州、杭州等地交流茶艺。^⑫这些访问团或学者大多受到高规格的接待,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苏州园林等举办,受到电视台、广播台和报纸等主流媒体的报道,其带有艺术性的表演受到各界欢迎,促进了茶艺的传播。两岸茶艺交流在

学术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1990年在杭州举办的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会议论文集中,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安平秋、北京中国茶文化研究会王玲、范增平、福建省茶叶学会庄任和吴雅真等人的论文中都频繁地使用了“茶艺”概念。^⑬

在茶艺概念获得普遍接受后,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不同认知和很大争论。总体而言,有两种趋向,一是给茶艺确定边界,在特定领域内理解,二是将茶艺宽泛化理解。在台湾,最早是将茶艺局限在饮茶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是1984年蔡荣章的观点:“茶艺’是指饮茶的艺术而言。……讲究茶叶的品质、冲泡的技艺、茶具的玩赏、品茗的环境以及人际关系,那就广泛地深入到‘茶艺’的境界了。”^⑭吴振铎在1987年《中华茶艺杂志创刊词》中说:“茶艺’是茶叶产、制、销的技艺与饮茶生活艺术之融化与升华的总称;是广义的‘茶道’,与农业、艺术、文学等有密切的关联。”^⑮同年,范增平《茶艺界说》将两种界定并列陈述:“广义的茶艺是,研究茶叶的生产、制造、经营、饮用的方法和探讨饮用的方法和探讨茶业原理、原则,以达到物质和精神全面满足的学问。狭义的界说,是研究如何泡好一壶茶的技艺和如何享受一杯茶的艺术。”^⑯这种两分法对大陆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期在界定茶艺概念时也基本是呈现这两种趋向。狭义界定茶艺概念的学者有丁以寿(指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的一套技艺),陈文华、余悦等(指涉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术);宽泛界定茶艺概念的学者有王玲、丁文(指涉制茶、烹茶、品茶的艺术),林治(种茶、制茶、泡茶、敬茶、品茶的技巧和艺术),陈香白(种茶、制茶、用茶的方法与程式)。从概念的精确、明晰和本质区分等角度来看,茶艺的广义界定失之宽泛,而陈文华、余悦等人将茶艺的内涵确定在泡茶和品茶范围内,相对来说是科学的。^⑰茶艺主要只是与泡茶和品茶相关的技巧和艺术,如茶、水、火的搭配,泡茶的流程和内涵,茶席和饮茶环境的搭配等。茶艺是一种茶事活动,属于生活美学和艺术的范畴,连接物质性的茶叶和精神性的茶道和茶文化思想,让茶叶有了与人类结合的契机和灵魂结合的途径,让精神和思想有了行为和过程的凭借和依托。

随着20余年知识的生成和研究的深入,茶艺逐渐从概念推广、品饮实践拓展到理论化总结阶段。2000年范增平在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推出了《茶艺

学》、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了《中华茶艺学》，尝试研究和论述茶艺的相关理论，“这是首部由台湾地区学者在两岸同时出版的中国茶艺理论著作”^⑩。该书的目的是试图裨益于中国茶艺的学术研究、推动茶艺事业，但从实际内容来看，内容比较庞杂，多是茶艺和相关知识的介绍，其对茶艺学概念的界定过于宽泛，称“所谓茶艺学，简单的定义就是研究茶的科学”。真正较好地构建茶艺学完整理论版图的是陈文华2009年主编的《中国茶艺学》，他的茶艺学概念建立在对茶艺是“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术”认知基础上的，探讨了基本概念，提出茶艺的五个时段的历史期，提出三种不同类型的茶艺标准，列明茶艺选茶、择水、备器、雅室、冲泡、品茶六要素，概括了茶艺的美学特征，并梳理了茶艺表演的历史、特征和编创原则。在此之后，茶艺学的图书有张凌云主编的《茶艺学》（2011年）、卢耿华的《茶艺学》（2013年）、夏良玉编的《茶艺学》（2017年）、黄友谊主编的《茶艺学》（2021年）；有的还将茶艺学进一步细分，如周红杰、李亚莉主编的《民族茶艺学》（2018年）。

二、茶艺的历史、流派与要素

如前文所言，茶艺概念出现和发展仅有40余年，在当代社会产生并快速传播。概念是对事物现象的本质化、凝练性概括，具有统摄力量，概念一旦形成不仅会向前发展，更可向后追溯。“十七年”时期中国史坛曾对“五朵金花”之一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不断向前追溯，一度有了春秋战国萌芽说、西汉萌芽说。^⑪茶艺概念的追溯同样如此，茶艺学术研究的重要贡献者张宏庸在1999年，出版的著作《台湾传统茶艺文化》中，将台湾当代以前的茶艺分为五个时期，即明郑时期、康雍乾时期、嘉道咸时期、同光时期、日据时期。在茶艺历史的回溯性研究中，大陆学者做了很多开拓。1991年王玲认为僧人促进了唐代茶艺的形成：“那些文化修养高的僧人从饮茶过程中总结出一套选茶、鉴水、煮茶的技艺，又讲究饮茶方法和环境，初步形成一套‘茶艺’。”^⑫方健在论文《唐宋茶艺述论》中，分析了煎茶、烹茶、煮茶、瀹茶、泼茶、试茶、均茶、点茶、斗茶、分茶等10种茶艺，辨析了不同名称的异同以及唐宋茶艺的变迁，并将这些茶艺与韩国茶礼、日本茶道作出比较。^⑬总而言之，

从大的历史阶段来看，中国历代茶艺主要有唐代的烹煎茶艺、宋代的点茶茶艺、明清及以后的泡茶茶艺三种。时代印迹鲜明、特征明显。冈天仓心《茶之书》套用西方的艺术分类，将三个流派分别对应古典派、浪漫派和自然派。

中国茶饮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当代热衷于茶艺的主体众多、背景多元，或复原历史茶艺，或改良或创造新的茶艺，故茶艺的种类和流派极其繁多。茶艺的早期代表性著作、刘汉介等编的《中国茶艺》记载，台湾流行的茶艺流派有“传统式”“宜兴式”“潮州式”“诏安式”“安溪式”五种。不同样式之间有一定的规范，如都选用小巧、精致、古朴的茶具，选用宜兴紫砂壶，多使用乌龙茶，都有烫盏、温杯、置茶、分茶等基本流程，样式之间的差别体现在具体的细节和流程上。就台湾省而言，其茶叶种类、地域、民族和茶具等都相对单一，茶艺种类不甚复杂。而我国大陆则截然不同，就茶叶种类而言，有六大茶类，故有根据茶类命名茶艺者如绿茶茶艺，还有根据名茶命名者如龙井茶艺。中国茶类和亚茶类众多，名茶数量亦如是。^⑭按照茶名区分茶艺固然凸显了茶，却容易忽视“艺”本身的内涵。也有根据地域特征区分茶艺者，如潮汕茶艺、武夷茶艺、台湾茶艺等。这种茶艺流派归纳法凸显了地域方面的差异和特征，有其合理性但却失之笼统，因一个地域内往往并不全然是一种茶艺流派主导。另有一种凸显职业和群体特征的分类法，如《中国茶叶大辞典》将茶艺分为文人茶艺、禅师茶艺、富贵茶艺、工夫茶艺、平民茶艺、儿童茶艺、江湖茶艺等^⑮。或者是以族群为分类方法，如瑶族茶艺、藏族茶艺、汉族茶艺等。第五种茶艺流派划分方法，是根据实施主体的不同来划分。有国家茶艺师职业（技能）规范标准所确立的国家茶艺，有行业协会、茶叶企业、茶艺馆等确立的团体茶艺，有茶艺教师所确立的个体茶艺。因组织和实施主体不同，它们的价值观和目标追求各异，各自茶艺呈现出有其特质的风格，如国家标准强调茶艺的知识性和基本技能的规范，大益、八马、华祥苑等有实力的茶企研发的茶艺都融入了自身的理念等。这是笔者提出的茶艺流派划分法。

陈文华主张既然茶艺的核心是冲泡和品饮，那么据此划分种类最为科学，小壶小杯冲泡的工夫茶艺，武夷茶艺、安溪茶艺、闽南茶艺、潮汕茶艺、台湾茶艺、香港茶艺等等都划归于此，各地茶艺

可在功夫茶艺前冠以地名；用盖碗冲泡茶叶的为盖碗茶艺，用玻璃杯冲泡茶叶的为玻璃杯茶艺，龙井茶艺、碧螺春茶艺、花茶茶艺、红茶茶艺、白茶茶艺、黄茶茶艺等都可兼用两种茶艺法。^④ 这种分类法其实是根据茶具不同而区分的流派，诚然茶具不同对茶艺的冲泡技法有很大影响，这种区分是合理的。

对流派众多的茶艺类型进行原型分析，会发现主要由三大类要素构成：基础条件、冲泡流程、品鉴香茗。基础条件是指茶艺实施的必备要素，首先是茶叶的选用，这是茶艺的基础，不同类型的茶叶往往会与不同的水特别是器具相搭配。其次是择水和备器，这是茶艺实施的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常谓“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古代对于水的选择有一套复杂的专门学问——辨水之术，当代择水以安全、卫生的矿泉水或纯纯净水为宜。器具是容纳茶汤的容器，首先从材质、实用、便利等角度考虑，在此基础上选用造型、色彩、纹饰等艺术性突出的茶具，而这两点都需要跟茶叶搭配综合考虑。茶、水、器三者融于一体，水和器具能够有效激发茶味，是确保茶艺水平能否发挥的保障因素。品茗又离不开一定的环境，这是茶艺的第四个基础条件。所谓品茗环境，既可以是茶、水、器所安放的茶席，也可以是茶室内整体装修和艺术风格所构筑的内部空间，具备条件的还以讲求茶艺的室外环境，如采用绿地、奇石、竹林、流水、小桥等。冲泡流程就是将茶叶投入茶具，冲入茶水并泡制出一杯香茗的过程。形形色色的茶艺流派之中，各家都有不同的先后展开顺序、时间和快慢、流程和手法等，甚为讲究，但其基本范式万变不离其宗，大体需要经过煮水、温盏、投茶、冲水、静置、分茶等，一泡结束后再重复动作二泡、三泡等。茶艺由泡茶和品饮两个环节构成，泡茶茶艺实施目的是为了品饮者有美好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感受，这就需要品饮者有一定的识别和鉴赏能力。在唐代时期，人们已经从赏汤形、观茶色、闻茶香、品茶味、赏茶具、悟意境等在六个方面展开品鉴鉴赏活动^⑤；唐宋以后赏汤形方面有所弱化，其他五个方面至今仍是品茗的重要内容。

三、当代茶艺的纷争与评述

中国当代茶艺已经有了 40 余年的历程，取得了不俗的发展和成绩，但也面临一些争论，这是不

能回避的。其一，认为茶艺及其概念不是台湾省学者提出的，而是早已有之，甚至是古已有之。丁以寿认为“茶艺”一词由胡浩川在 1940 年所创，出现在其为傅宏镇辑《中外茶业艺文志》一书所作的序里，其中有“津梁茶艺，其大裨助于吾人者，约有三端：今之有志茶艺者，每苦阅读凭藉之太少，昧然求之，又复漫无着落”之语，文中两次出现“茶艺”。^⑥ 细读上下文，此处茶艺将种植、加工和品评全部包含在内，更多是沿袭传统的观念，与当代茶艺有很大不同。笔者在前文已经考证，“茶”“艺”二字连用成词，在《射务通考》中已经出现；但该词汇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和推广使用，也没有赋予其新含义，故其价值相对有限。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大陆“创立茶艺”，源与流的关系应该正本清源，不能本末倒置。^⑦ 该观点的提出者引用了台湾谢东闵、阮逸明、张宏庸等人的论著或发言，予以证明。毫无疑问，中国茶艺历史悠久，而台湾省的茶艺发展史一般只追溯到明清时期，其当下的各种茶艺流派也多源于闽、粤、浙等东南各省。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概念与实指之间的区别。作为一种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无疑是始自台湾省的学者，但其所指向的对象无疑是深植于中国历史的。当然，少数学者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其背后有所隐含，即不愿认可台湾省茶艺之风对大陆的影响。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省学者的茶文化自觉和茶艺构建是充分利用中国深厚的文化以及现实茶艺基础上而实现的，不过是“春暖鸭先知”而已。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大陆各个领域的文化都发展起来，甚至超过了台湾省最初的创造和成就，影视、音乐等是如此，茶艺亦如此。还有一点，两岸人民对茶艺的共同体认，是对中国文化母体的认同，有利于文化交流和往来，正如 1988 年范增平在上海茶艺交流时所提出的那样：“茶是中华民族为国饮，也是名副其实的‘和平饮料’，它融合世间情谊，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说，两岸统一是通过民间外交，从茶开先实现的。”^⑧

最大的争议是对茶艺概念的质疑，认为茶艺倾向于技的层面，不能够统摄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若只是泡茶的技艺很怕被讥为雕虫小技，总要说些经国济世、修身养性的道理才足以显现它的学科价值。于是选用词汇的时候就斟酌于茶艺与茶道之间了。”^⑨ 有研究者研究了唐宋时期的茶史，认为

“茶道”概念起源于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唐代已经孕育了茶道思想，日本茶道深受中国的影响。但宋代以后中国茶道不彰，饮茶多停留在感官和日常生活层面，由于客观的历史原因没有向思想领域深入开掘；日本则不同，在佛教、宫廷贵族文化的滋养以及武士阶层权力的强化下，茶道在日本获得了极大发展，乃至成为日本文化的象征之一。中国学者对此深以为憾，在观摩了日本茶道后，在香港推广茶艺的叶惠民曾感慨“日本茶道表演现在确实比我们有功底”并发愿“搞一套有理论，有程式，有文化内涵的表演模式”^③，这或许代表了中国人内心的集体意识。故20世纪80年代开始参照日本茶道，着手中国茶道体系的探索、建立和发展。日本以“和、敬、清、寂”为茶道基本精神，中国学者则从历史文献中提炼出“美、健、性、伦”“清、敬、怡、真”“和、俭、静、洁”“廉、美、和、敬”“理、敬、清、融”等四字关键词。在著作方面，黄墩岩出版了《中国茶道》（1983年），探讨了中国茶道的历史源流，是一部较早研究中国茶道的著作。大陆学者丁文先后出版《中国茶道》（1994年）、《茶乘》（1999年）、赖功欧《茶哲睿智》（1999年）、林治出版《中国茶道》（2000年）等，都在探讨中国茶道的源流以及茶道的儒释道文化资源。这些研究是当代茶文化发展到一个历史阶段的标志，具有学术价值和意义。陈文华对于这一现象的评价比较公允：“这些主张仅是现代茶人对中国茶道的理解和阐述而已，并不等于古代就有如此丰富、如此完备，如此理想的理论体系。”^④

但有些学者和相关人士根据当代茶道的构建，抨击茶艺，认为茶艺概念将中国深厚的茶道思想拉低到了“技”和“艺”的形而下的层面；更进一步，对于当代茶艺和茶艺表演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进行抨击，认为年轻的女性茶艺师之所以“花拳绣腿”根源在于她们茶道修养不高。^⑤这种评论或多或少有其合理性，但总体来说失之于偏激。第一，茶道是无形的、抽象的概念，茶艺不仅是概念还是有形的实体，茶道需要茶艺为载体才能呈现，茶艺需要茶道的指导才有灵魂，两者是“体”“用”关系，不是对立和割裂的关系，茶艺和茶道的合体是茶文化。范增平将两者关系形象地称为“茶艺是茶道回家的路”^⑥。诚然如此，只要翻一下各种与茶道相关的论著，谈论茶道者无不借由茶艺等方面的问题来讨论茶道。其次，从日本茶道历史来看，

日本茶道的核心是“茶汤”“茶器名物”，而非所谓的“和、敬、清、寂”一类的概括。^⑦家元制度所带来的权力和体制化等让日本茶道更注重形式，而中国更注重品饮以及品饮带来的意境和审美感受，用“茶艺”来概括中国茶文化是合适的。最后，我们要深刻理解20世纪70年代姜子匡等提出“茶艺”概念的初衷：第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道”过于神圣、沉重并带有一定神秘色彩，不易接受，事实上唐代以后中国并不倡导道茶，相反“艺”和茶的品饮特性一直是文人的追求，茶的艺术化特征在明代的文人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第二，日本已将“茶道”概念专美于前，我们中国使用“茶艺”一词与日本有所区别，既是文化自觉的标志，也是中国当代学者的一种学术原创能力的体现；第三，茶艺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让茶文化的层次性更加明显，茶艺术不但是承上启下，衔接抽象茶道和具体的茶技术方法，更是表明了品饮是茶文化的中心活动过程^⑧；第四，茶艺的职业化和技能化以及表演性、观赏性、艺术性和竞技性，这些是当代社会的一种创造，大大助推了茶业的发展，同时也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期待。

实际上，经过不遗余力地推广，茶艺概念及由此构建的体系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在东亚文化圈内。早在1987年，韩国石云龙便参照中国的茶艺体系，出版了《韩国茶艺：茶生活入门》的著作。在世纪之交，日本的学者也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茶艺发展情况，以区域研究的方式分析了北京的茶艺馆。^⑨筑波大学还有博士学位论文以日本茶道和中国茶艺为中心，系统地比较了东亚茶文化的异同以及相互联系和影响。^⑩中国还通过孔子学院在日本开展茶艺教学活动，以及举办茶艺师职业资格考，考试相关教材在2007年也被翻译为日语；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茶艺更容易掌握，中国茶艺精神符合日本人生活需求，在日本尚有较大的推广空间。^⑪中日韩之间茶艺交流，中国各类团体和个人经常到两国展示茶艺，已经成为国际文化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茶艺发展中或许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这需要在时间中解决，在竞争中完善。茶艺是当代中国文化复兴和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也是当代中国学者、业者等不同群体的共同文化创造。

注释：

① 林默彪：《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12期。

② 刘礼堂、宋时磊：《中华茶文化的源流、概念界定与主要特质》，《农业考古》2020年第5期。

③ 张乾友：《个人知识、专业知识与社会知识——知识生产的历史叙事》，《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1期。

④⑭ 陈文华主编：《中国茶艺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1—32页。

⑤ 杞庐主人：《射务通考》卷17，清光绪二十三年石斋石印本。

⑥ 宋时磊：《中国台湾茶叶国际贸易及其茶文化的历史变迁》，《台湾农业探索》2015年第1期。

⑦ 《乾茶艺术化》，《申报》1937年5月17日。

⑧ 徐庆钟：《题词：发扬茶艺》，《台湾茶业》1948年创刊号。

⑨ 范增平：《姜子匡先生与茶艺》，《纪念姜子匡先生百岁冥诞之民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9页。

⑩ 陈文怀：《台湾茶事》，《中国茶叶》1986年第2期；陈文怀：《台湾茶事（续）》，《中国茶叶》1986年第6期；陈文怀：《台湾茶事续篇》，《中国茶叶》1987年第6期。

⑪ 高菊儿：《日本的茶道与台湾的茶艺》，《福建茶叶》1987年第1期。

⑫ 陈文怀：《海陆茗家首相聚 中华茶道共弘扬——台湾陆羽茶艺文化访问团访问香港、大陆纪略》，《茶叶》1989年第3期。

⑬ 参见王家扬主编：《茶的历史与文化——'90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摄影出版社1991年版。

⑭ 蔡荣章：《现代茶艺》，台湾中视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02页。

⑮ 吴振铎：《中华茶艺杂志创刊词》，《中华茶艺协会专刊》1987年第1集。

⑯ 范增平：《台湾茶文化论》，台湾碧山岩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88页。

⑰ 余悦主编：《茶文化博览·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148页；陈文华主编：《中国茶艺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⑱ 《中华茶艺学》出版，《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

⑲ 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

⑳ 王玲：《两晋至唐代的饮茶之风与中国茶文化的萌芽与形成》，载王家扬主编：《茶的历史与文化——'90

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摄影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㉑ 方健：《唐宋茶艺述论》，《农业考古》1997年第4期。

㉒ 王镇恒、王广智主编：《中国名茶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㉓ 陈宗懋主编：《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577页。

㉔ 宋时磊：《唐代茶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256页。

㉕ 丁以寿、蔡荣章：《中国茶艺》，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㉖ 余悦主编：《茶文化博览·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㉗ 金晓东：《台湾茶艺“特使”在上海》，《文汇报》1988年7月9日。

㉘ 蔡荣章：《摸清误区里的茶艺与茶道》，《茶道》2021年第6期。

㉙ 杨巽：《香港茶人的情怀——记叶惠民先生》，《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

㉚ 陈文华：《论中国茶道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与儒、释、道的关系》，《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

㉛ 韩义海：《义海说茶 世情百态皆茶道》，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2页。

㉜ 周本男记录、范增平修订：《茶道、茶艺、茶文化的来龙去脉——范增平接受陆留弟访谈纪录》，《农业考古》2011年第2期。

㉝ 顾雯、宋时磊：《“茶器名物记”文献与日本茶道的成立——以镰仓到江户时代为中心》，《农业考古》2021年第2期。

㉞ 邓时海：《中国茶艺的骄傲》，《坪林茶业博物馆开馆“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坪林茶业博物馆2005年版，第56—62页。

㉟ [日] 穴戸佳蠓：《中国の茶馆文化——北京の茶馆と茶芸馆》，Human Science Research第11册，早稻田大学大学院人间科学研究科2002年版，第69—87页。

㊱ [日] 柯一薰：《東アジア茶文化比較研究：茶道と茶芸を中心として》，筑波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㊲ [日] 谷津阳子：《中国茶艺在日本推广现状及前景实证研究》，上海交通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简介：宋时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汉语写作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晓慧）